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茅 盾

MAO DUN

代表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茅盾代表作

苏振鹭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01号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茅盾代表作

苏振鹭 编 责任编辑 曲 哲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19 插页1 字数437000

1988年5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7,209

ISBN7-215-01526-2/I · 109 定价11.80元

前言

茅盾，是我国“五四”以来现代文学运动的伟大先驱者和开拓者之一，是世界瞩目的文坛巨星。他以具有时代意义的现实主义创作、精湛的文学理论、批评和众多的文学翻译，在文学史上矗立起一块灿烂的丰碑，永远为世人所铭记。

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总是属于他的时代。茅盾1896年出生在浙江省桐城县乌镇的一个姓沈的大家庭中，原名德鸿，字雁冰（“茅盾”是他1927年发表小说时开始使用的笔名），1981年在北京逝世。他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阶段。他始终置身于时代运动的狂澜中，与之同呼吸共命运。他的少年时代，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日趋高涨，从具有“维新”思想的父亲和并不太封建的母亲那里他受到了爱国思想的启蒙教育。中学时代，他忧国忧民，希望社会改革的爱国心使他无条件地拥护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失望，但那忧国忧民之心却无法平静。1916年8月，他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从此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时到“五四”运动爆

发前，他一方面进行翻译介绍工作，一方面写了一些杂感和社会论文。在《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下，他站在改革者的立场上，以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向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旧道德、旧传统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呼唤着青年要“奋斗自立”，“革新思想”，“创造文明”。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新、旧民主革命的转折点，它引导着千百万革命青年踏上新的征途。茅盾也正是在它的影响和推动下，被当时正在全国广泛传播着的马克思主义所吸引。“因为那时已经知道，俄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我走过的道路（上）》）。为着探求改革社会的真理，他于1919年尾开始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1921年期间，他曾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述，其中包括像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只译了第一章）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使他通过这些翻译活动，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

从“五四”运动爆发到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茅盾一方面积极投身于革命实际工作，于1921年先后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积极从事党的工作，并于1926年初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工作，1927年初去武汉，主编汉口《民国日报》。另一方面，他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于1921年初与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发起组织了我国最早的纯文学团体之一的文学研究会。在这前后，他还彻底改革曾被鸳鸯蝴蝶派占领的《小说月报》，使之成为我国最早出现的新文学刊物之一。这期间，他主要的文学活动是从事理论批评和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并开始散文写作。在理论工作上，他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和文坛

创作现状，积极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并随着革命的发展，不断更新其内容，为我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理论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翻译工作上，他翻译了大量进步的外国文学作品，为我国新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大革命失败后，茅盾由汉口经庐山潜回上海。大革命的挫折，又由于和党失去了组织联系，他一时看不清中国革命具体前进的道路，而陷入了失望和幻灭的痛苦中。但他对共产主义理论是坚信不移的，相信中国革命会继续前进的。于是在不断探索中国革命具体前进道路的同时，“要以我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从牯岭到东京》）而开始小说创作。由《幻灭》、《动摇》、《追求》三个略带连续性的中篇组成的《蚀》，写于1927年秋至1928年春，是茅盾小说创作的处女作。这中间他还完成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创造》的写作。

1927年7月初，茅盾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也为了改换一下环境，振奋革命精神，东渡日本。在日本，他除了完成总题为“随笔七篇”的一组散文和《自杀》等七个短篇外，1927年4月至7月写了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虹》。从《虹》中可以看到大革命失败罩在作者思想上的阴影已经消褪。

1930年4月初，茅盾由日本回到上海。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不断深入发展，极大地鼓舞着茅盾。回国后，他立即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与鲁迅、瞿秋白等共同战斗，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致力于推动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1931年至1933年间，他曾两次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1932年底到1934年11月，他和鲁迅一道支持黎烈文主编和革新《申报》副刊《自由谈》，从“鸳鸯蝴蝶”派手中夺取了一个重

要的阵地。他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了60多篇抨击时政，针砭时弊的杂文，与鲁迅的杂文互相配合，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1933年7月，他还和郑振铎组织“文学社”，出版《文学》，到1937年“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时停刊。这是《小说月报》以后上海大型文艺刊物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是左翼作家、进步作家驰骋的一个重要阵地。在这期间，他还和鲁迅一道支持陈望道创办以散文为特色的《太白》半月刊。还与鲁迅一道创办了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译文》。鲁迅逝世后，上海文坛一时显得很沉闷，他又和一些作家组织了聚餐会形式的“月曜会”，以便加强联系，交流情况。

在创作上，从回国到1931年前后，茅盾力图运用无产阶级观点扩大题材范围，从而更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这期间，他先后写了取材于历史和传说的短篇小说《豹子头林冲》、《石碣》（以上两篇取材于《水浒》）、《大泽乡》，借古以鉴今。还写了取材于学校生活的中篇小说《路》和《三人行》。1932年前后，作者的创作进入了成熟阶段。他的鲜明的无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对三十年代社会生活的广泛而细致的观察，以及艺术经验的丰富的积累，使他写下了长篇巨著《子夜》和收进《春蚕》、《泡沫》、《烟云集》中的短篇小说，此外还写了中篇小说《多角关系》，散文杂文集《茅盾散文集》、《话匣子》、《速写与随笔》等，为三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增添了异彩。

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茅盾始终置身于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的革命激流中。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广泛团结国民党统治后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的工作；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他和广大的革命进步的文化人士一道

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及其发动的反人民内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文艺阵地》创刊号上，茅盾发表了《文艺阵地的使命》一文。这期间，“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茅盾担任了《文学》、《文季》、《中流》、《译文》停刊后的战时联合刊《呐喊》（第三期起改名《烽火》）的主编和《救亡日报》的编委。1937年底，他离开上海，辗转到达香港，主编《文艺阵地》和从上海迁到香港去的《立报》的副刊《言林》。1939年3月，他应杜重远之邀到达迪化（乌鲁木齐），担任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任新疆文化协会会长、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会长，大力促进新疆的进步文化事业。不久，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反动面目暴露，迫害进步人士，茅盾在党组织帮助下离开新疆，经西安与朱德一道去延安。在延安期间，他在鲁迅文艺学院讲学，参加群众文艺活动。同年11月，在党的安排下，茅盾离开延安到重庆，参加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皖南事变”发生后，党组织安排茅盾和一批文化人转移到香港开辟“第二战场”。日本侵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香港后，茅盾和一批文化人在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于1942年3月辗转撤到桂林。同年12月，他第二次到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3月，茅盾由重庆取道香港回到上海，积极从事民主运动。同年12月初，他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赴苏访问四个月。1947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加紧迫害进步人士，他被迫再次去香港。1948年底，他在党的安排下经东北去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2月中旬到达北京定居。

这期间，茅盾在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生活中一直坚持创作。他这期间的创作发扬他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又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启示，坚持文艺为革

命服务，“深入社会，面向民众”的原则，把握时代脉搏，迅速反映现实斗争。他写了中、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劫后拾遗》等，短篇小说《耶稣之死》、《委屈》等以及大量的散文、杂文。《幸文》

18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主要从事文化领导和政协工作，同时，写了不少文艺论著和文艺批评论文，为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不顾衰病，仍旧从事具有现代我国文学史和政治社会文化史宝贵史料价值的回忆录的写作（未全部完成）。《文》

1801 茅盾是时代的骄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革命文学事业，奋斗了终生。他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暂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曾于1931年和1940年两次要求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在他病危之际，再一次向党中央申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表达了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表达了他对伟大共产主义事业坚贞的崇高的信念。党中央批准他恢复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文》

1801 茅盾的创作以小说称著，尤以中、长篇小说的成就更为卓著。他的小说创作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的。这期间，他写出了中、长篇小说15部，短篇小说约54篇（就目前我们所见到的）。他在从事小说创作之前，就已经是一位卓有见地的现实主义理论家，已经初步形成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因此，从创作开始，就自觉地坚持现实主义原则进行写作，并不断以丰硕的成果为丰富发展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五四》以来，以鲁迅为杰出代表所形成的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瞒和骗的文艺”（鲁迅：《坟·论睁了眼》），要求作家站在时代前列，正视现实，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揭示社会矛盾，表现时代精神。茅盾在其文学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中，与此相一致，进而反复强调文学作品必须反映时代精神，要求作家“在横的方面”，要洞察“社会生活的各环节”；“在纵的方面”，要透视“社会发展的方向”（《茅盾自选集·序》），从而真实地反映“全般的社会现象”和“全般的社会机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使文学能够成为社会历史的画卷。他在艺术实践中努力实现这一创作思想。

首先在题材的选择或立题开掘上，他总是注意时代性和重大性，总是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敏锐的观察力捕捉能够反映时代脉搏的重大题材。茅盾在谈到自己的许多小说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关注时曾说：“我总以为我敢涉足他人所不敢写而又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大题材，是原因之一。”（《外文版〈茅盾选集〉序》）总观他一生的小说创作，可以说其取材无一不涉及到有关旧中国社会变革的重大问题。将其创作分成几个阶段来看：第一阶段，二十年代后期，以《蚀》、《虹》和收进《野蔷薇》中的短篇小说为代表，都是相当集中的取材于从“五四”到大革命失败后的知识青年的生活，透过他们的觉醒、苦闷与追求，突出地反映这一历史时期波澜起伏的社会革命所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剧变；第二阶段，三十年代初、中期，以《子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等为代表，取材则着眼于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和阶层的生活，大规模地表现了三十年代初、中期中国都市、城镇、农村的阶级矛盾和日趋尖锐的民族矛盾相交织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及历史

发展的趋向；第三阶段，抗日战争时期，除《霜叶红似二月花》取材于“五四”前的社会生活外，像《第一阶段的故事》、《劫后拾遗》、《走上岗位》（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作者据此改写成《锻炼》）、《腐蚀》、剧本《清明前后》等，则均取材于现实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的同时，越来越深刻地反映了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各阶级和各阶层的动态，鞭挞了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动势力，讴歌了为民族解放而抗争的革命力量；第四阶段，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如《惊蛰》、《一个理想碰了壁》、《春天》等短篇，取材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覆灭的历史命运，高奏出人民革命胜利的凯歌。茅盾四个阶段小说创作的取材虽有变化，但他始终执着现实，注视着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四个阶段题材所反映的时代生活是紧密衔接，互相补充，极其自然地形成了我国从“五四”前夜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的形象的历史长卷。

当我们论述茅盾小说创作具有历史画卷的成就时，很容易联想到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以他的《人间喜剧》被恩格斯誉为用“编年史的方式”描绘了法国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整个时代面貌（《给哈克纳斯的信》）。托尔斯泰以他的艺术杰作被列宁盛赞为“非常突出地反映着……1861年以后和1905年以前的时代”，而成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的确，茅盾小说创作的成就完全可以和他们相媲美。但是比起这些前辈艺术大师来，茅盾更有其独到之处。固然茅盾在其艺术实践中无论从创作方法或是艺术技巧上都从这些前辈艺术大师的创作中得到启迪，吸取了他们艺术经验的精髓。然而茅盾作为无产阶级艺术家却是以马

克思主义为创作指导思想，自觉地从中国革命发展中去描绘他所处的时代，因此我们从他的作品，特别是三十年代以来的作品中，更能确切地感受到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性，而为作者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鼓舞。这一创作指导思想的先进性及作品所达到的思想高度，鲜明地显示出茅盾和前辈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的差别，而成为他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三

茅盾小说取得历史画卷式的成就，还在于作者越来越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从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与人的关系分析中，揭示出特定历史时期生活内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首先从作者的许多作品对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描写中不难看出这一点。例如《蚀》，取材于作者所亲身经历的大革命时代的斗争生活，集中描写了“五卅”以后到大革命失败间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向。尽管写《蚀》时作者的思想情绪比较低沉，但他还是站在革命者的立场冷静、客观地对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因此在作品的社会环境描写中，《幻灭》开始部分的描写分明显示出北伐进军前封建军阀统治下使人难耐的窒息空气，《追求》的描写也令人信服地感受到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肃杀空气，尤为突出的是，在《幻灭》的大部分和《动摇》的描写中，作者既以激荡的笔触展现出大革命发展的汹涌气势，也从大革命统一战线的复杂阶级关系中，揭示了在这一革命中鱼龙混杂的阶级状况，更从领导这一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的实际着眼，触及到由于一些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斗争经验不

足，在革命高潮中易于冲动而出现的一些“左”的倾向。而混入革命组织中的阶级敌人（如《动摇》中的胡国光）就利用群众中一些“左”的情绪，故意制造许多“左”的幼稚行动，破坏共产党的声誉，破坏革命，从而有力地揭示出大革命中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作者这一犀利地剖析符合历史真实，充分显示出时代特征。

再如《子夜》，比起《蚀》来，在社会环境描写上的成就更为突出。《子夜》的时代背景是1930年春末初夏。作者以这部作品的艺术手段参加当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作品通过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为发展民族工业几经挣扎终于失败的悲剧，“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作品的第一章通过光怪陆离畸形发展的上海街景的描写，既点出了故事发生的地点，也分明地揭示出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第二章借吴荪甫父亲丧事的场面，让各种头面人物出场，而通过他们互相交谈，既道出了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军事形势，也点出了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各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加紧经济侵略而造成中国民族工商业陷于困境的经济形势，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通过吴荪甫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与工人群众的矛盾冲突，以及围绕这两组矛盾冲突和吴荪甫的家庭、社会关系的各式各样的人物描写，反映出在“工业的金融的上海”社会里，不同社会集团和阶级的人们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与搏斗，在集中揭示城市生活的同时，通过吴荪甫与农村的经济联系，作品的画面也转向了农村。尽管这部分未能充分展开，却也显示出农民与地主阶级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而吴荪甫就在这惊心动魄的阶级搏斗中挣扎并陷入了失败的境地，从而形象地正

确地说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子夜》对社会环境描绘的深刻性，还在于它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围绕着吴荪甫与裕华丝厂工人群众的冲突，作品展现了工人群众不断发展的罢工斗争。此外，农民群众武装占领双桥镇，以及侧面反映的红军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也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日益发展的革命力量。这些斗争反映了人民大众与三大敌人的根本矛盾。尽管作品对这方面的描写还存在不足之处，但却与吴荪甫的悲剧命运形成强烈的对比，使人从中预感到中国的前途正孕育在这方兴未艾的工农革命斗争中，作品题名“子夜”，指出它所描写的是中国最黑暗的年代，但这是黎明前的黑夜，对于中国人民终将冲破黑暗走向黎明的确信，构成《子夜》社会环境描写的有机部分。

作者不仅在中、长篇小说中充分展示了社会环境的时代风貌，就是在短篇小说的描写中也同样是非常突出的。例如《春蚕》，以“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的江南农村为背景，通过老通宝一家养蚕丰收却卖不出价钱反而欠了债的事实，着重揭示了造成这种“丰收成灾”的社会原因。小说第一章把社会环境描写渗透在自然景物描写中。例如，那“……一所灰白色的楼房蹲在‘塘路’边，那是蚕厂。十多天前驻扎过军队，现在那边田里还留着几条短短的战壕。那时都说东洋兵要打进来，镇上有钱人都逃光了，现在兵队又开走了，……”的描写，分明点出了小说故事发生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并且道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加速了民族工业的破产。又如另一段景物描写：“呜！呜，呜，呜——汽笛叫声突然从那边远远的河身的弯曲地方传了来。……一条柴油引擎的小轮船很威严地从那茧厂后驶出来，……满河平静的水立刻激起泼刺刺的波浪，一齐向两旁的泥岸卷过来。一条乡下‘赤膊船’赶快拢岸，船上人揪住了泥岸上的茅草，船和人都

好像在那里打秋千。轧轧轧的轮机声和洋油臭，飞散在这和平的绿的田野”。这是一段极富象征意义的描写。那条“柴油引擎的小轮船”象征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造成中国农村经济的危机，使得中国农村经济，像那“乡下赤膊船”一样，被“波浪”冲击的飘摇不定。老通宝一家的命运紧紧系在这一社会现实中，老通宝一家的遭际，或者说整个三十年代初的“丰收成灾”的社会原因，固然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盘剥分不开，同时也与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军事侵略分不开。

茅盾小说在反映时代生活的深刻性上，还表现在作者善于在渲染时代氛围中塑造出一系列富于时代感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他的作品揭示生活的广泛性决定了他笔下人物的多样性。在他的人物画廊中，工人、农民、市镇群众、流浪乞儿、小职员、青年学生、“时代女性”、地下革命工作者、教授学者、诗人作家、地主、恶霸、帮会流氓、市井恶棍、交际花、资本家、买办、工贼等等，无所不有。作家在塑造这些形象时，总是以他明确的阶级分析把握人物的阶级属性，又总是以他对社会全面的观察，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还总是以他对时代特征的深刻认识，在渲染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空气中展示时代给予人物的影响，从而使他笔下的人物以血肉丰满的性格展现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时代的脉搏。例如，从“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的老一代农民老通宝的身上，人们不仅看到农民特有的勤劳、善良、质朴、执著于土地的品质，以及由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封建传统意识的毒害造成的狭隘、保守、迷信的弱点，还可看到三十年代初的时代影响在他身上打下的明显印记。那就是：一方面他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更加依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变本加厉的经济侵略加速

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的现实还“不很明白”。“洋鬼子怎样就骗了钱去”，但却能直感到“洋鬼子”确实是破坏了固有的农村经济，并使他产生了“几乎气成病的”焦躁不安的心理情绪，而时时牵动他的思想行为；另一方面正在蓬勃发展的农民群众反抗压迫的革命风暴又在冲击着他。尽管他顽固、保守，但是他从他那逆来顺受的惨重教训中终于在临终前意识到他的儿子多多头走的抗争道路“是对的”，从而显示出时代的巨大感召力。比起老通宝，他的儿子多多头绝少旧的精神负荷，年轻一代的农民从动乱的社会现实中对传统的生活信条提出了怀疑，认为“单靠勤俭工作，既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因此他能更快地接受时代的感召，从“吃大户”而走上武装抗争的道路。从多多头的身上，人们分明看到农民“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能够斗争，而且斗争得颇为顽强”（茅盾：《我怎样写〈春蚕〉》），作品不仅从两代农民身上揭示了三十年代初农村经济破产的社会原因，同时也显示出劳动群众觉醒的时代特点。

在茅盾的人物画廊中，更能显示作者的艺术成就的，还在于他成功地塑造出一系列“时代女性”和民族资本家的形象。这两组形象在他的小说作品中多次出现，形成两组人物系列。如果按作品反映时代内容来排列，前一组则有《创造》中接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勇往直前的娴娴；《虹》中受“五四”浪潮的冲击走出家门，而在“五四”浪潮激荡下由个人抗争走上集体主义革命道路的梅行素；《幻灭》中受到大革命的感召，在革命中不断追求不断幻灭的静女士；《动摇》中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斗中，以大胆的性爱揭穿封建礼教的虚伪，又以坦荡的胸襟看待事物的孙舞阳；《追求》中不安于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现状，但又未能走上正确道路而陷入放纵情欲的章秋

柳，《子夜》中在三十年代初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都市生活中陷入苦闷而焦躁不安的张素素；《锻炼》中在抗战初期抗日爱国浪潮激荡下积极向上的严洁修、苏辛佳；《腐蚀》中曾在抗战初期不惜与封建官僚家庭闹翻而参加抗日活动，但在国民党特务的引诱和自身的享乐放纵生活支使下沦为特务，终又在光明的力量感召下开始走向自新之路的赵惠明等等。比起同时代的作家，茅盾笔下的“五四”以来的新女性更富于时代感。这就在于作家总是把她们放在时代激流中，总是把她们个人的心灵颤动和进退升降与时代的动向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她们的思想行为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显示出作者在塑造“五四”以来新女性的形象上有新的突破。

后一组民族资本家的形象，如果也按作品反映的时代内容来排列，则有《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的王伯申，他是“五四”前，表现出与封建势力有着尖锐矛盾冲突的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形象；《子夜》中的吴荪甫，则是三十年代初，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依附大资产阶级，而在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角逐上演出了一场破产悲剧的民族资本家的形象；《赵先生想不通》中的赵先生、《多角关系》中的唐子嘉，也都是三十年代中叶前，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无路可逃的民族资本家的形象；《第一阶段的故事》中的何耀光、《锻炼》中的严仲平，则是抗战初期具有民族意识而又不断动摇的民族资本家的形象。在作者笔下这些民族资本家大多具有鲜明的个性，在各自不同的个性中无不表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特有的革命性和软弱性的两重性的阶级共性。例如，《子夜》中的吴荪甫的个性是十分鲜明的。他倔强好胜，有魄力，有想成为中国工业王子的勃勃野心，而且有手段，手段用起来阴狠毒辣，但是他的内心又充满了恐惧、失落感，这种精